

## 前 言

外交思想，由一国领导外交的官员的有关思想观点表述出来，也由外交实践，包括国家有关外交的文献、有关人员的外交活动和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反映出来。

外交思想首先就是决定和指导一国对外政策的那些思想。所谓外交，不外是代表国家和政府的部门和官员，向有关外国和国际组织，从政治上对有关问题示明情况、表明态度和传递信息的一种非军事的行为和姿态，这种行为和姿态总是为了执行一定的对外政策的。同时，由此而构成的国家和国家之间总的政治关系，人们也用外交关系来称呼它，<sup>①</sup>它当然也是有关国家对外政策执行的结果。由此决定了外交思想总是同决定和指导一国对外政策的思想有关。

外交，在任何国家都一样，是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服务的。因此，对外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到国家对内的基本政治经济路线和任务要求，这方面的关系，人们经常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来形容。对外政策的制定，还要考虑到国家对外战略、策略方面的要求，因而要对国际形势、国际矛盾关系和国际格局等方面进行观察。这些方面所形成的一定的思想观点，并在对外政策中得到反映的，都属于外交思想的范畴。

谢益显：《外交智慧和谋略——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原则》，16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国内经济政治运作和阶级矛盾关系发展的结果，但是也不能离开二次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大背景。毛泽东曾经分析：“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sup>①</sup>这样的分析告诉人们，既要认识新中国诞生时的国际大的形势背景，也要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大的形势背景，与此相联系的是要认识大的时代的性质。关于这方面的认识都同一定的外交思想的由来有关。

这里所谓的时代，是指世界经济政治及其在阶级意义上的反映在人类社会中已经达到一个什么阶段。时代不过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但如果把不同性质的时代在概念上明确概括出来，它就能在宏观上对观察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起根本的理论指导作用。因为，它可以使人们较快地意识到，“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sup>②</sup>。

二次大战后，新中国所处的时代同 1917 年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一样，世界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

<sup>①</sup>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147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sup>②</sup>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见《列宁全集》第 21 卷，123～12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代，<sup>①</sup> 世界上决定时代中心内容和发展趋势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这样两种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因而，人们不但必须重视这一现象在国际上的反映——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关系，还必须重视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关系，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些矛盾关系形成的基本的国际格局，尤其是这些基本矛盾关系在一个一个具体历史阶段呈现的现实的战略格局，其所反映的现实的国际形势，对各国外交及其思想有更为直接的影响。为了认清中国是在对一些国际问题作了怎样的考虑后形成一些外交思想的，就需要明确新中国诞生时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外交总是为一国的存在（生存）和发展服务，这是外交的本质，它决定了外交总的主题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所谓国家利益，往往集中反映在一国的对外总目标中。不同性质的国家，其对外的总目标往往不一样。历史上军国主义性质的日本，其对外的总目标是军事侵略和扩张，人们都是清楚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反映在国家对外总目标上是和平与进步。由此可见，所谓国家利益总是反映一定的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外交所服务的国家利益总是有阶级性的。这就决定了外交思想是有阶级性的。

但是，理论上所肯定的外交所服务的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是就总体而言；在具体外交场合，由于外交往往是一种和平共处意愿的体现，交往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如果只顾宣传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交往就会无法保持下去，因而有时具体的外交形式似乎是超越意识形态，区别不出什么阶级性。这是外交的一个特点，同时这也是外交思想的一个特点：总体上外交思想有阶级性，但某一具体思想观点很可能是说不上什么阶级性的。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毛泽东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①</sup> 新中国的外交思想是中国领导人和有关人员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企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外交实践的产物。因此，谈到新中国外交思想的形成自然包含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但本书行文不离开外交主题去孤立地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问题。

国家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对于制定对外政策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国家领导人不但有马列主义的思想修养，还受到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的熏陶培育，显然后者对中国外交思想的形成也有影响。但是本书行文同样不去孤立地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卓越思想的影响问题。

外交思想既反映在领导人所明确阐明的有关外交的思想观点中，也反映在领导人所领导进行的外交实践中。正因为如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很可能不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也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并形成了外交思想历史的阶段性。如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史中，可以区分出：1949～1978年是毛泽东、周恩来时期，1979年之后是邓小平时期。

国家的不同领导人在外交思想方面不会是绝对的一模一样的。但是一国对外总目标方面的要求，只要国家性质不变，在不同领导人之间是几乎不变的。新中国成立至今，在和平与进步的总要求方面，中国的历届领导人的思想是相同的。与此相关的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在中国历届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中，也是没有什么不同的。除此之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因主客观条件的不同是会有不同的。

外交思想史同外交史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是外交思想的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后者则是外交实践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外

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年9月15日。

交历史上有这样的情形：从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来说，已经出现重要阶段性的时候，从外交实践的政治层面来看，却还不能说出现了重要的阶段性。如：1958年，中国领导人显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关系形成某种观点，后来在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方面影响极大，但是，这不构成中国外交实践中出现了什么大的阶段性，因为，中国外交实践中一段时间以来奉行对外以对美矛盾为主要矛盾的观点，这一点在1958年后的相当时期里并未改变。这种情形将会反映到本书的分期里，即本书将以外交思想出现明显阶段性为分期依据。

外交思想同外交实践两者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因为外交思想的相当大的部分，是附着于外交实践而反映出来的。外交思想史从思想观点提出问题，而联系外交实践时是为了说明思想观点。显然，外交思想史重视经由外交实践来说明思想观点，应该说，这是叙述外交思想史的一个基本方法。这就决定了，外交思想史的编写必然不同于关于领导人外交思想观点的文件汇编和语录。本书将以叙述构成外交史线索的重大外交事件中的外交思想作为主体，以各种外交对策中所体现的具有特点的思想加以充实。这是围绕外交实践来谈外交思想的部分。此外，外交思想当然也通过口头和文字表述出来，本书将以专门一章加以简明的归纳性的叙述，以使结合外交实践进行叙述时难以包括的许多外交思想观点不致遗漏。在结合外交实践叙述外交思想的部分，在行文中将注意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的要求。

思想和经济政治的关系，或者称为意识形态和经济政治的关系，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表述法，是“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

集中的表现”<sup>①</sup>。由这一观点出发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政治，但它必然极大地影响到经济和文化（人们的观念），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既是其政治史之始，也必然是其经济史之始和思想史之始。同样，197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大的阶段，它必然同时开辟了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大的阶段，也开辟了中国思想史（包括外交思想史）的一个大的阶段。这也同本书分期有关。

新中国外交思想发展方面大的分期，可以有几种分法。如：可以分为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时期（1949~1978）和邓小平外交思想时期（1979~ ）；还可从外交主题着眼分为反帝、反殖、反霸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时期（1949年至70年代初），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时期（70年代至80年代初），以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期（80年代中期起）。根据国际基本矛盾关系的演变状况，往往在大的分期中还可以分出不同的小的阶段。本书的分期，同上述两种大的分期相比分得稍为小一些，既有不同，又基本上是重叠的。另外，按照外交思想出现的阶段性来分期，不强求年数多寡的一律和接近。

<sup>①</sup>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663~6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第一章

##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开始建立时的思想 (1949~1950)

### ——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一边倒”和反帝反殖

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天，外交随之发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公告宣称：“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从新中国诞生第一天起，中国外交思想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建立起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建立起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新中国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即建立起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同时展现了自己的外交思想。

#### 一 新中国外交总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一告诞生，对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也随之发生。外交方面一些总的指导思想和要求，也因客观上的需要而产生。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和国家文献中可以看到，当时对于外交，在根本方面的一些指导思想是明确的。

##### (一) “另起炉灶” 崭新面貌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这标志经历一百多年的外来殖民侵略压迫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的民

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sup>①</sup> 中国人民将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风貌来展开对外关系和对待国际事务。

在国际社会中，中国是具有尊严的、平等的一员，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她具有尊严，再也不能居于受屈辱的地位；她是平等的，再也不能处于一种依附的、俯仰由人的不能自立的地位。新中国的外交同旧中国处于屈辱依附地位的外交在精神面貌上应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对新中国外交的总要求之一。它的具体操作实际要由后面的三点去体现。

## （二）新中国奋斗总目标即为外交总目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新中国诞生时所制定的《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社会制度和政府与人民的奋斗目标等。其中，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新中国要“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是中国内政外交的一个总的奋斗目标。很显然，为此目标而奋斗，这就是新中国以一个有尊严的、平等成员的身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好的方法、途径、姿态和品格。而单就外交而言，新中国的外交要为国家根本建设任务服务，为国家在国际上取得应有的受尊重的平等地位服务。质言之，为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尊严服务。说到底，为自己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实际上，这是任何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外交任务。但是，新中国在建国之初，把它更加具体地凝结成为“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是中国外交为之奋斗的总目标。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

### （三）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外交的独立自主为基本立场

中国必须独立自主，这一点在中国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中是非常明确的。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sup>①</sup>周恩来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

外交上的独立自主立场对新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旧中国名义上是独立的，却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事实上，当一个国家在政治上依附于别的国家，或者一个政府出于某种不光彩的政策考虑，对外屈辱投降时，它的外交就无法做到独立自主。旧中国政府依附于外国列强，清末统治者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掩饰自己对外屈膝投降的态度；民国时期的蒋介石政府在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名义下，同样的对外屈服投降，后来又几乎一切惟美国之命是从。他们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独立自主的。旧中国的外交使中华民族蒙受屈辱。新中国外交担负着历史传递下来的任务要求：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一项根本使命，确切地说，是它的品格和属性。

反对帝国主义，既是当时为保卫世界和平所必需，也是当时为推动世界进步所必需。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序言部分载明“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这一叙述既包含《共同纲领》上述提法的含义，又可以在相同方向上包含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见《周恩来选集》，上卷，3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更广泛的内容 从而显得更概括、更深刻。

#### （四）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为外交总的任务要求

新中国建立时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结合新中国诞生时所处的国际形势，这样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它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总的任务要求。

这个总要求，在往后的日子里不会从根本上作整个的变动，但是随着新中国历史的发展，在具体表述时可以有所补充、丰富和发展。例如，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国政府提出的“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思想 显然是上述总要求的补充。

新中国外交的总的指导思想在新中国外交的整个发展历史中是始终存在的。

## 二 关于外交阵线、国际格局和策略路线的思想观点

### （一）“一边倒”的决策和如何掌握外交阵线

新中国成立了。当它产生对外关系，接触国际事务，并参预到国际社会里去了以后，必然产生一个立场问题。二次大战后，国际上仍然存在着三大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是使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产生立场问题的客观背景。这些基本矛盾关系的具体发展状况是非常复杂的，要想确定自己的正确立场，则必须根据形势和条件对各种国际力量作出战略的配置，即对外交阵线要有一个正确掌握。

第一 作出了“一边倒”的决策。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文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sup>①</sup>毛泽东是主张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

第二，站在两个阵营中的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这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是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的是帝国主义阵营。

周恩来说：“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 反对帝国主义”。<sup>②</sup>

世界两大阵营是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毛泽东在 1949 年致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和总理的电文中，清楚指明了“以美国反动政府为首的帝国主义阵线”和“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sup>③</sup>

第三，对资本主义世界“应该区别对待”。<sup>④</sup>1917 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体系。从此，世界上有着两种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开始了。列宁当时在一份报告提纲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 第 4 卷，1472~147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④ 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见《周恩来外交文选》，1~2、53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见《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17 日。

中指出，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存在着帝国主义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区别，而这是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sup>①</sup>。新中国一建立，周恩来就指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周恩来指出对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应该区别对待”，指的是对待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国家而言。他当时分别指出了这样几种国家：同我国最敌对的国家；同我国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同我国正在谈判尚未建交的欧洲国家；同我国已经建交的欧洲国家；同我国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及日本等。

第四，需要区分敌我友。新中国面对各种国际力量，有一个把它们各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来对待的问题，即国际知识专业著作中称之为“战略配置”的问题。在周恩来的词汇中就是关于“外交阵线”、“外交战线”的问题。前面提到的几点都属于掌握外交阵线的问题，但还需要从敌我友的角度来认识问题。

新中国初期，这个外交阵线就是：中国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个国际和平民主阵营反对的是帝国主义阵营，因而外交阵线中大的敌友阵线是清楚的。这个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中有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国家，中国同它们之间是联合的问题。这里，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成员相互之间都是友。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和平民主国家之间还有个我和友的区别。

同时，在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还有个进一步的我友之别。周恩来说：“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大家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

<sup>①</sup>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见《列宁选集》，第4卷，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有差别 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sup>①</sup>

至于对待帝国主义阵营，在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时候，敌和我的界线是清楚的。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反对新中国的问题上并不见得都是一样的，认识这一点也有必要。周恩来在《新中国的外交》一文中这样指出：“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在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sup>②</sup>这对提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外交思想水平是重要的。

在这个阵营中，中国特别要注意对付美国。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sup>③</sup>他在说到反对帝国主义时，专门点了美国的名，而未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名。从区分敌友的角度来说，其含义是清楚的。因为美国出头露面敌视和反对中国。

## （二）对国际格局、主要矛盾和大战形势问题的分析

二次大战后 美、英、法同苏联在如何处理战败国及其有关问题上 至 1947 年取得了签订意、罗、保、匈、芬五国和约的一定成果，但在处理德国等更为重大的问题上，西方大国同社会主义苏联之间各行其是。与此有关的是，经过战争洗礼，作为东西方力量对比所反映的现状即欧洲的政治地图，特别是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和安全保障，却因德国问题未解决而连带地没有得到合法保证。在此种背景下，丘吉尔发表了要求美英联合起来对付苏联的富尔顿演说，同时美英在舆论中进行反苏战争宣传，由此造成了一种形势：战后所谓的冷战开始了。美苏对峙和冷战，成为人们对战后国际格局的看法。

中国领导人对战后的国际格局，还有另外一种表述法：“中间

<sup>①</sup> 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见《周恩来外交文选》，6、2~3、3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地带。”194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谈到当时的反苏战争宣传时说：“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美国 and 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sup>①</sup>这就是中间地带说的最初表述。

中间地带说主要提出了国际格局和国际主要矛盾问题。

所谓国际格局是指国际基本矛盾关系展现和发展的状况，由人们以最简明的语言，作为一种格局表述出来。美苏对峙和冷战是关于国际格局的一种表述法，中间地带说也是一种表述法。中间地带说承认了美苏对峙和冷战及其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应加以补充，即指出在看到美国和苏联这样两极的同时，还要看到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中间地带说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来说，有着更直接的指导意义。

至于国际主要矛盾问题，中间地带说既然指出了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将不是苏联，而是处在中间地带“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那么，主要矛盾即存在于这些国家同美国之间。而从整个国际矛盾来看，需要引用毛泽东该篇讲话中的另一段话。毛泽东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193～1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说：“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地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sup>①</sup> 这里已经把问题同第三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提，也即是说，国际主要矛盾存在于美帝国主义同中间地带国家和人民之间。<sup>②</sup>

中间地带的国际格局观，对于分析认识国际的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中间地带说认为，美国发动战争将首先指向中间地带国家，而不是苏联；而由于人们心目中的大战即是美苏战争，因而，根据中间地带说，可以认为，大战形势是不存在的。

关于大战打不起来，毛泽东在 1946 年谈过，1950 年也谈过 1946 年时他说：“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sup>③</sup> 这里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提出“必能”克服战争危险的看法。1950 年时，毛泽东认为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获得更大发展，制止战争危险的可能性就更大。他说：“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

①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119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这一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见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延安《解放日报》，1947 年 1 月 4 日和 1 月 5 日。）该文系毛泽东授意所写，并“曾经毛泽东多次修改”。见《周恩来外交文选》，489 页及注释 343，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见《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118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量 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 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1946 年，中国人民正在进行打败蒋介石反动派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的国内革命战争，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动力量发动世界大战的企图和蠢动给予了最有效的打击和制止。而 1950 年时，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使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同世界反动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世界人民的转变，使反动派所企盼的战争形势更加难于形成。新中国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说法，是具有说服力的。

### （三）中苏结盟和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

有了对外交阵线的掌握，有了对敌友我的区分，才能正确制定方针政策。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奉行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

统一战线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国内革命中所创造的“三大法宝”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政治中也加以运用 成为对敌斗争的基本策略手段。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了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 指出：“在国外 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 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sup>②</sup> 如果从外交阵线，从各种国际力量的客观地位来看，上述国际和平民主阵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提出统一战线问题，就是要求处于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国家，在主观上需要明确运用统一战线的思想武器，来做到有效地对付帝国主义。

在国际统战思想中，中国明确，有主要要对付的力量——美

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4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国，有主要要联合的力量——苏联。在中国人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美国大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新中国诞生后，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与中国人民为敌，还积极扶植日本，使军国主义的势力相当程度地保持下来。中国人民不能不从国家独立和安全的角度对美国保持高度的警惕。尽管在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没有特殊地举起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的旗帜，但在中国的国际统战思想中，主要对付美国是清楚的。至于苏联，是给过中国人民国内革命事业以支持的惟一国家。二次大战后，当惟一的经过战争反而更加强大大起来的美国“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计划”<sup>①</sup>时，毛泽东就指出：“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sup>②</sup>中国总是认为，在反帝阵营中，首先需要联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中国首先抓住中苏结盟这个关键。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缔结中苏同盟，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协定。该条约宣告，中苏两国政府“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它直接反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和重新侵略，但更有实际意义的，首先是反对美国利用日本以进行侵略的任何阴谋。因为当时美国独家军事占领着日本，所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和反对任何同日本相勾结的国家进行侵略，矛头都是指向美国的。

贯彻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需要认真掌握区别对待的方针与统一战线思想的关系。关于对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区别对待问

<sup>①</sup>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2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sup>②</sup>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3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